

評馮客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柯伶蓁*

書名：*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作者：Frank Dikötter

出版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時間：2007年

頁數：XV+382pp.

—

馮客（Frank Dikötter）1961年生於荷蘭。1990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現已在世界多國用多種文字出版各類專著，主要包括《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感謝張瑞德教授及匿名審查人對於本文給予諸多建議及寶貴的意見。）

in Modern China)》¹、《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²、《不完美的概念：中國的醫學知識、生育缺陷和優生學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³、《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⁴、《麻醉文化：中國毒品史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⁵和《洋貨：摩登玩意與中國日常生活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⁶等。

馮客認為民國是一個體驗全球化的時代，因而從嶄新的角度微觀社會，從小處建構整體，不拘泥於既有史觀。他眼中的民國是絢麗且引人入勝的，其運用新文化史的角度和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上諸多問題，頗受西方學術界的重視。孫隆基曾說馮客把傅柯研究過的題目，如性史、監獄、醫學等話語，都移植到中國史研究，可謂「中國史之傅柯化」，並對此提出了批判。⁷暫不論馮

¹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譯本，馮客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² Frank Dikö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³ Frank Dikötter,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⁴ Frank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譯本，馮客著，徐有威譯，《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⁵ Frank Dikötter, Lars Laamann,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⁶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⁷ 孫隆基，〈論中國史之傅柯化—評馮客 (Frank Dikötter)〉，《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臺北，2004.6），頁155-168。孫隆基以馮客之著作討論史學應用理論的分寸，批判馮客之研究雖跳脫黑格爾、馬克思傳統的宏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卻以後設文本 (metatext) 代之，同樣簡化了預先設定歷史過程中的正反勢力，此種方式將同馬克思主義官學，淪為「黨入股」，而集大成於中國研究

客是否贊同此說法，但我們仍可從其著作中看到傅柯對他的啟發。

二

現今史家日益重視下層群眾的日常生活經驗。1970 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出現的日常生活史學（Alltagsgeschicht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⁸，便是此一新研究取向的呈現。其將過去的一些「瑣事」納入學術研究，使我們對前人的食衣住行育樂有所認識，從而更容易想像以往的生活空間及人們的活動。換言之，日常生活史研究者希望能由不同的視角去看過去的歷史，並且強調由下而上的歷史，除以之補充或修正主流論述外，⁹也希望能由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尋找到歷史變遷的動力，¹⁰因此有學者認為日常生活史是微觀史學（Microhistory）。¹¹這股風潮也逐漸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史家希望以新觀點來詮釋中國近代史。

馮客的《洋貨：摩登玩意與中國日常生活（*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以新的觀點重繪中國日常生活的物質藍圖，與盧漢超《霓虹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¹²一書相互輝映。馮書試圖描繪 19 世紀中葉

者，非馮客莫屬。

⁸ 相關理論可參閱 Ben Highmore 著，周群英譯，《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台北：韋伯文化，2005）。

⁹ 以往史學多受社會科學影響，強調跨學科和長時段的結構研究，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地在尋歷史演變的規律，這種宏大敘事與結構分析，使得歷史上許多人事物消失於歷史敘述之中。日常生活面向的研究，可使我們看到更複雜和更貼近社會現實的民眾生活面貌，也可修正以往史學的論述，如盧漢超對黃包車伙生活及其主體性的描述，有別於馬克思史學對剝削下層社會的論述，亦由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理解國家對一般人民的意義，而非將國家作為日常生活的基礎結構。

¹⁰ 可參考霍布斯邦（Hobsbawn, E）著，馬俊亞、郭建英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論來自下層的歷史〉。

¹¹ Gregory, Brad S.,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 101;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7.

¹² Lu Han 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本書有中譯本：盧漢超，《霓虹燈

至 1949 年期間中國日常生活樣貌的變遷。他認為早在 19 世紀末，人們廣泛層面的物質文化已與全球潮流糾纏不清，且若外國事物藉由現代化菁英扮演著指導社會狀態的角色，那麼，多數外國事物皆可找到進入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方式（頁 1）。本書也以充分的證據顯現新商品如何快速地成為日常結構的一部份。洋貨雖帶有現代進步象徵，卻也有著對抗帝國主義的矛盾心理，作者試圖從文化適應滲透（acculturation）的角度，描寫外國物品如何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且隨著全球化經濟出現的物品被無止盡循環（endless circulation）、馴化（domestication）和再製（recycling），而常受到文化保護者的阻礙（頁 5）。作者認為因地制宜的文化適應（inculturation）較同化（acculturation）更易導致廣泛的文化和物質改變，而以極快的速度改變中國。此外，作者亦試圖以資料去分析探究全球化理論，主張物質現代性並非外人強迫給予的一套東西，而是一種技術的新可能性，是藉由多變的想像方式而加以創造性挪用（creative appropriation），以個案研究來進行比較分析。作者以馬鈴薯和菸草為例說明，認為外來事物將隨著時間的演進成為傳統的一部份，因此認為沒有完全為中國專有的文化。

本書主題編排是根據日常生活歷史中的一般分類，而以居住、服飾、飲食分章節，第一章〈導言（Introduction）〉，說明本書將如何展開論述。作者以 1842-1949 年為研究斷限，以文化適應滲透為切入視角，認為此較同化易導致廣泛的物質改變，其認為若將研究方向置放於仿效、消費和表述具有危險性，並說明其所採用資料形態以視覺資料為主，以補文本資料之不足。本書將後面章節分為傳播與挪用兩大部分進行討論。

第一部分是關於控制物質產品生產與消費的架構和網絡。作者希望打破前此一般人關於中國閉關自守的迷思，指出許多事物在 19 世紀以前中國便已借用或是複製。第二章〈洋貨的馴化（The Domestication of Foreign Goods）〉，提供晚清洋貨廣泛輸入

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的歷史背景，並對晚清的洋貨、輸出的商品和國際商品的仿製加以討論，認為以外國模式來製造產品是有長期的傳統、個別工人對零件組合成複雜物品的生產、小企業在 16 世紀市場擴大前便已流傳、人口快速成長下廉價勞力的容易取得，這些都促進了洋貨的馴化，且為使洋貨進入廣大但相對貧窮人民的生活，洋貨以低成本的方式被仿製。

作者在第三章〈新事物的傳播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Objects)〉，試圖更精細地去觀察這些物品的傳播，對象包括小攤販、流動商人、定期市集或是設立在沿海貿易城市的大商店，甚至是百貨公司和跳蚤市場。另外，即使窮人仍無法觸及這些現代物品，但在公園、博物館、學校甚至是監獄等場所接觸，這些扮演啟蒙運動新事物教育任務的場所擺放的物品，仍使人民眼界大開。現代物品的能見度也經由圖像革命而提高，現代形象以海報、月曆、廣告和香菸卡的形式進入每戶人家。第四章〈從航運到陸運 (From Water to Wheel)〉指出，直至 19 世紀末，中國的運輸仍十分落後，主要為人力、獸力車和船。經由歐洲運輸革命所輸入的輪船和火車等，改變了中國交通的樣貌，鄉間的公車交會和城市間的火車產生了一種新網路，除人們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這些新交通工具也延展了新物品傳播的網絡，並加快了物品傳播的速度。

第五章〈改變中的城市樣貌 (Changing Cityscapes)〉簡短地勾勒現代城市的出現和學校、工廠和辦公室中的物質藍圖，這些社會場所常是人們初次接觸新事物和物質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與場所，新物品透過這些顯而易見的建築進入人們的生活之中，雖然多數的城市建設由政府或政治精英直接干預，但全球化的驅動對一般民眾的作用強於社會精英。作者在第六章〈電力、電話、自來水 (Electricity, Telephone, and Water)〉，觀察逐漸出現的現代公用事業，包含電力、電話和自來水，並探討其意義與使用。水泥、玻璃和鋼筋被視為現代性物質，電燈、自來水和電話藉由現代設備的廣泛網絡連結私生活與公共空間，從而改變了日常生活

實踐。

整體而言，作者在第一部分強調方法和意義，顯示個別使用者如何以其自身獨有的語言來理解物品，並以自身獨有的目的來使用物品，且常與物品生產者所設想的不同。此外，雖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可變因素提高，但使用者仍是形塑市場偏好的中心。一般人民儘管受限於金錢而須做有限的選擇，但他們仍持續地改變現代中國的物質藍圖。

本書第二部分是探討不同社會背景的個體是如何改變日常生活。第七章〈住宅 (Dwelling)〉探討了房屋和家庭物品。新的建築材料（如水泥、玻璃）和建築概念，使得房子有別以往，而與外界隔絕。家庭物品探討的範圍則由窗戶使用的玻璃到簡單易取、普遍使用的器具如煤油燈、鏡子和鐘，作者特別指出家庭的擺設是中國日常生活物質藍圖改變的開始。

第八章〈服飾和裝扮 (Clothing and Grooming)〉作者擬探討日常呈現的本質。由於衣服是物質文化研究中最受喜愛的主題，服飾打扮往往是社會區別觀察的重點，因此作者檢驗了身體如何藉由現代性的許多人工製品來穿衣、打扮和裝飾，且觀察各階層的服裝用色，也觸及史家較少談論的鞋子，並約略談及香皂、牙膏等清潔用品。此外，雖然食物常被認為是不易受外國影響的生活方式，但作者在第九章〈飲食 (Eating and Drinking)〉說明了飲食的各層面，如項目、方式、使用器具等，認為它們都因全國連結和全球經濟而多樣化。其不僅擴大既有的烹飪技法和飲食項目，且快速吸納了外國的食品，如牛奶、冰淇淋、起司、可樂等，這些飲食方面的改變並不僅限於沿海城市的富有階級。

本書最後一章〈見聞 (Seeing and Listening)〉集中討論聲音和影像的機械再現。照相機、電影、電話和收音機吸引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個體，並改變了人們視覺和聽覺體驗的方式。作者試圖探討何以照片能滲透日常生活，而從裝飾、紀念人物或祖先祭祀等面向討論。作者表示，照片上也有中國傳統的殘留，如蓋印章、書法題字等，而留聲機雖然主要是富有階層財富和休閒的象

徵，但也普遍存在於市集以吸引消費者，而後收音機也取代了以往鑼和鞭炮形式的消息傳遞。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全球化或許對於商品傳播全世界有助益，但它並未創造文化同質性；相反地，商品藉由無數人的多樣化日常生活觀念與實踐，使更複雜的文化表現成為可能，即便這些文化表現上的區別而後因全球化而逐漸消弭。

三

近年來西方史學界受到「敘述復興」(revival of narrative) 的影響，史家漸不滿於小人物在大歷史中的消失，而主張過去所認為的邊緣人物才是歷史書寫的中心，必須由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找回歷史的真義，但日常生活史學自出現以來便不斷招致批評，而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如何界定日常生活的範圍，其次是邊緣人物主體性。¹³近年來，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年輕學者的喜愛，出版了不少的相關書籍。¹⁴但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有待釐清，亦即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不少研究者企圖從中國中心史觀出發，但多半在二十世紀日常生活的圖像尋找未受西方影響、堅持傳統的部份，同時，也「不斷地突顯現代的行政制度及社會規範如何（無情地）闖入日常生活的領域，

¹³ 首先界定日常生活範圍的爭議在於日常生活概念不清、界線模糊且其應含括哪些內容，簡言之，即日常生活的定義為何；但日常生活史學研究有一明顯的趨勢，即為邊緣人物的中心化，將專注焦點轉向社會底層人物，如妓女、黃包車伕、勞工等。其次在邊緣人物是否具有主體性上，因對於國家角色的認定不同，而產生兩派說法，一派認為這些民眾具有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而國家的角色在其生活中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太相關，如盧漢超；另一派認為在政治的監控或相關的規範下，一般民眾呈現相對軟弱，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變動因素是基於新政策的推行，其所能享有的主體性是相當有限的，如王笛。

¹⁴ 最近幾年出版關於近代中國日常生活的書籍，如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Mark Swislocki, *Culinary Nostalgia: Regional Food Cul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Shangh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Shuk-wah Poon,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相關主題的中國碩博士論文更是為數不少，在此不多加詳述。

打亂老百姓原有的生活節奏與秩序。」¹⁵從而導引出現代化和日常生活常處於競爭狀態的論點。日常生活史是否能突破以往的框架，為中國史研究另闢新路？這仍是值得深究的問題。本書是首次全面談及民國時期西方現代物質對於中國物質文化影響的研究成果，其在研究視角及資料應用等方面，確有值得稱許之處。

首先，在研究視角方面。作者企圖由物質文化來描繪中國日常生活的藍圖，對食衣住行分章進行細部的討論，並以文化滲透適應和創造性挪用的概念貫穿全文，提供了一種有別以往的視角來觀看中國人民如何逐漸接受、使用「現代性」物品。作者認為中國人根據各自的目的和理解，使物品的使用多樣化，也將自身文化的傳統加以應用、融合在「現代性」物品，這是相當有趣的觀點。其次，在資料運用方面。作者除掌握西方的相關研究及資料外，亦因深諳中文而掌握了許多中文的文本和圖像資料，諸如雜誌、期刊、報紙、回憶錄、文學作品、社會調查、詩集、照片、廣告、藝術品等，透過這些圖文資料的爬梳與比對，描繪出民國時期中國的日常生活景象。

本書雖具新意，有其貢獻，但仍有部分地方可再加以討論。

首先，就寫作方式而言，作者運用了不少文化研究或社會科學理論的概念來討論與解釋中國人對外國物品的運用情況，賦予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一個嶄新的面向，但筆者認為，本書作者在使用相關詞彙，如文化滲透適應、創造性挪用、再現等概念時，雖有輔以例子說明，但可多作闡述，避免讀者因不同理解而產生認知上的差異，如在談論注射器時，指出一般民眾將其用來注射嗎啡（頁 10），謂此為創造性挪用，但亦可能產生此為「誤用」的爭議，若能加以說明則更加適宜。此外，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運用至中國情境的適切性，仍是值得深思之處。

其二，就資料運用和解釋而言，常因不同的問題意識而產生不同的論述。如前所述，作者企圖在全球化的架構下，以文化滲

¹⁵ 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17：4（臺北，2006.12），頁276。

透適應的理論和創造性挪用的方法加以詮釋中國物質文化的轉變，所有資料的運用也都扣緊此一主題，為此提供了相當充足的證據。但在盧漢超的研究中，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上海現代化形象並不是那麼的真實，廣大下層民眾主要仍是過著傳統的日常生活方式。¹⁶相對於作者的論述，兩者產生了歧異。那些資料是否代表的僅是代表每一個「個人」對生活的看法？現代史史料浩瀚如海，研究者可能選取一些相同意義的史料，最後歸結出一個結論，而造成其他可能見解不同的資料被忽略了。

作者引用的資料，例如《良友畫報》、北京的社會調查、金融月刊等，大部分集中於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廣東等，因而對於沿海城市的物質演變有較為深入的描寫。但就中國內地而言，其雖有提到四川、蘭州等地，但論述不多；加以中國城鄉差距甚大，因此難以沿海城市的轉變來觀察內地物質生活的轉變，如同張仲禮所指出，「租界是外國勢力侵入中國的基地，但也是中國引進西方事物的窗口…城市的開發，更新得到了更早、較大的推動，相對來說，未建有租界的城市，就缺少這樣的發展條件」，¹⁷因此內陸部分的討論也是本書較為欠缺的部份。例如成都，王笛在討論成都街頭文化時，談到新的文化因素出現，如購物中心、電力、路燈、汽車等，他指出，這些改革雖試圖改善一般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但民眾並未總是從中得到好處，也並非所有民眾都樂於接受，甚至竭力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¹⁸因此，若能多加描繪內陸地區，所呈現出來的中國物質生活改變將會更為立體與多元。

但在資料運用上，本書作者也面臨由下而上書寫歷史的難處，即一般人民生活的資料紀錄不易取得。近代中國知識並未普及，一般人民多目不識丁，因此所留下的資料，仍多為知識份子

¹⁶ 見盧漢超，《霓虹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一書。

¹⁷ 張仲禮編著，《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582。

¹⁸ 王笛著，李德英等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頁357。

所作，至少是識字者所書寫的。在此情況下，這些資料所反映的當時中國普遍大眾的物質面向與接受度，便稍嫌薄弱，這也是日常生活史研究者經常遭遇的問題。如何尋找、運用資料與資料和論述方面的契合度，值得研究者深思。

其三，就章節安排與內容部份而言，作者將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強調物品傳播，再分別論述外國商品輸入的背景、傳播、交通進展、城市樣貌改變和公共事業的發展；第二部份著眼於挪用，由住宅、服飾裝扮、飲食和聲音影像的重現分章討論，可見作者試圖全面描繪中國物質生活的樣貌轉變。但在章節安排上，本書以物品傳播與挪用為經，物品種類為緯進行分析討論，在各章細部的描述中則稍嫌零碎，在物品種類個別變化以及歷史脈絡的描述較為不足，只在第二章做了約略的討論，各章節中難以看出當時的時代風氣和社會心理對於新物品的接受與使用產生何種影響與作用。蒲慕州曾強調：「政治社會史研究的結果往往是生活史在描繪一時代人生活情態的背景，有時還是能了解某些生活的基本條件。」¹⁹因此在進行日常生活史研究時，應該注意時代背景與主題的密合，才能對歷史做出有意義的觀察和解讀。

其四，政治權力的作用。作者在文中鮮少談論政治權力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作用。不可否認的，國家或政治權力對人民生活具有影響力，但若把政治作為形塑日常生活的力量，則又陷入過往的框架中，但個人生活的主體性是否真能超脫國家影響之外？如在 1920 年代重慶現代化的過程中，由重慶商埠督辦潘文華以「上海模式」推動重慶城市規畫，引入了銀行、電影院、咖啡館、汽車等各項西方現代城市景觀，快速改變了重慶的面貌與日常生活。²⁰此外，在新生活運動期間，政府推動的一連串作為，對於現代性物質的傳播與使用，勢必產生相當的影響力，但作者卻未加以討論，或許也可多加思考兩者間的互動。

¹⁹ 蒲慕州，〈西方近年生活史研究〉，《新史學》，3：4（臺北，1992.12），頁153。

²⁰ 可詳見張瑾，〈發現生活—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重慶城市社會變遷〉，收入李孝悌所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2005），頁329-366。

上述的意見見仁見智，但無損於筆者對本書的肯定與推薦。本書無疑為研究中國近現代日常生活史值得參考之書。作者此書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推進了一步，特別在物質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現代性轉變上，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